

周民震和他的电影文学创作

□特·赛音巴雅尔(蒙古族)

壮族电影文学作家周民震准备出版《周民震文集》五卷本,约250万字,邀我为之作序。周民震是老革命、大作家,比我年长几岁,是我的大哥、学长、朋友,是我创建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的坚定支持者、无私帮助者。所以,对周民震文集的出版,除了祝贺之外,还是有话说的。

周民震是广西鹿寨人,1932年生,解放前在中学读书时就组织进步文学团体“奔流社”,出版文艺刊物《奔向太阳》,使其成为团结广大学生和革命青年的文艺阵地。他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1月加入共产党,任柳州游击队中队政治指导员,参加游击战争。1949年12月广西解放后,他的中队参加了惨烈的剿灭残匪战斗,因为表现突出,1951年2月被全建制调往抗美援朝前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1954年转业到广西文化部门工作,几十年来一面积极工作一面热情创作,文学成果颇丰。1959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后成为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改革开放后组织送他进中央党校培训,毕业后担任广西文化厅厅长、广西文联副主席等。

他195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电影文学剧本20多部,还写过一些歌剧、话剧、京剧、桂剧。其中,电影《春晖》获1982年全国优秀故事片奖,《心泉》获广西铜鼓奖,《甜蜜的事业》获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及广西人民政府特别奖,《三朵小红花》获广西首届民族文艺优秀作品奖,剧本《苗山红》获1956年中南现代戏汇演优秀节目奖,话剧《邓小平与李明瑞》获广西第三屆剧展二等奖,编剧一等奖。

上世纪中叶,我看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苗家儿女》,是反映广西苗家山寨人民建设家乡的故事。电影一开始,刚从前线复员回来的军人卡良,进村便遇上参军前自己暗中爱慕的姑娘迈香,正在与自己一起长大的朋友春亮举行婚礼。这一情感打击使他一下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想再次离开家乡重返部队。然而,家乡火热朝天的现实生活,使他个人感情中摆脱出来,毅然投身到家乡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影片还突出表现了苗家山寨在农业生产中的矛盾:是只顾粮食生产不顾森林保护,还是根据自然条件进行“农林并举”。《苗家儿女》故事情节生动,人物性格鲜明,生活气息浓郁,民族特点突出,人物的对话和影片中的插曲,以及那些婉转动人的芦笙和动听感人的民歌都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所以,我记住了这个电影的名字,也记住了这个电影的作者周民震。为此,上世纪90年代,我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时,以《壮族作家周民震和他的电影〈苗家儿女〉》为标题,以单节形式写了进去。

周民震是《民族文学》杂志的编委、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会长,但他平日的行政工作很忙,我们来往并不多。我有时打个电话约个稿子,有时在某个会议上

见了面,就握手、问问好而已。2003年9月,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的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我以《正确估计和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为题发言。那时候周民震已退休,也来参加这次会议。那次我们聊得比较多,也比较深。比如,如何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如何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等问题。惊奇的是,我们俩的想法基本一致。

2005年9月15日,我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建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时,他来信祝贺。2007年5月30日,我创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落成典礼仪式上,他专门写来条幅“草原上升起不落的文星座 那是我们民族文学的家乡——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奠基”。2009年春,文学馆建设在经费上遇到困难时,我和10位民族作家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希望得到支持和帮助。周民震就是其中的一位。后来,这一项目顺利得到资助。2009年9月15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举行开馆庆典,周民震不顾年老体弱,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呼和浩特参加庆典活动,回去后又给我个人寄来墨宝。前些年,我到南宁出差时,他还专门把我请到家里做客,他夫人李秀琴亲自下厨做好壮族特色的饭菜招待我。这些都是他对我上的关心和支 持,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在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很多,其中壮族作家最多。我认为壮族当代作家中,陆地、华山、周民震的文学成就都 很高。在电影文学方面,周民震不仅在壮族作家里,而且在整个少数民族作家里,也很突出。

电影《甜蜜的事业》是周民震在新时期创作的优秀影片之一。故事情节是这样的:蔗农唐二婶是一位争强好胜的妇女,接连生了5个女孩,分别取名为:招弟、迎弟、来弟、盼弟、梦弟。她非要生个男孩才肯罢休,于是又怀上了第6胎。然而命运像是有意捉弄她,第6胎生下的仍是女孩。唐二婶不禁怨天尤人,甚至认为:“这倒霉的医院净生女的。”唐二叔是个有事业心的科研人员,但由于家务拖累,每日脏衣服、大盆,煮饭要一大锅,上街后面跟着一大串,使他的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唐二婶的女儿招弟与糖厂田大妈的儿子玉宝相爱了,身为计划生育委员的田大妈却不愿自己的独生子到唐家上门女婿,后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田大妈同意玉宝去上月,唐二婶也接受了绝育手术。而田大妈则让女儿四秀招技术员杨爱甘为婿,两家一同办了喜事。电影反映的是我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当时正是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年代,但人口的过快增长却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周民震抓住这一题材,表现出了他把捉社会问题的敏锐性,也表现了他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另外,这部电影较好地体现了喜剧的特点。影片中的唐二婶,是当时存在于广大农村的一个典型形象。周民震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紧紧

抓住了这一人物的喜剧性格,将她放置在喜剧人物产生的社会环境和逻辑中加以刻画,围绕着种种矛盾,层层展现出这一人物的思想和心理变化。最后,她觉悟到:“没有国家哪有大家,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周民震在创作这部电影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此,而是在电影中将这一主题导向深层,进一步写出了各种人物在这一矛盾面前的各种心态,使这部电影的趣味性、艺术性和思想性更加真实、更加深刻。

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春晖》《心泉》《远方》是周民震创作的反映中学生、小学生、大学生生活的三部力作。《春晖》通过一个中学的高中毕业班师生在高考前的一段生动感人的故事,着力表现了班主任凌老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培育新一代有文化有道德的青年人的高贵品质;同时也反映了这一代文化生在高考的“关口”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克己助人的高尚品德。《心泉》通过小学生蒙小民从撒谎到诚实的演变过程,证明了一个平凡而真实的道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毕竟是向上的、美好的,那些在“动乱”年代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来的坏习惯、坏毛病都会被一一刷洗干净。《远方》反映的是大学生生活,塑造了杨春、于小明、韦老师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反映了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中的一些人物所走的不同道路和命运。这三部电影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形象鲜明,看完后使人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心灵上的陶冶。

周民震是一位文思敏捷、创作严肃的电影文学作家。他创作的所有电影,题材都是捕捉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并且运用生动活泼的喜剧形式将这些新人新事表现出来。这是他善于选取的一个最佳的表现形式,也是他的独特本事吧。

周民震能在电影文学创作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认为原因是多重的。他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既是书香门第又是革命家族,从小得到了理想、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良好教育。他生长在刘三姐的家乡,从小听唱山歌,听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爱看地方戏剧和电影。他不仅爱唱、听、看,而且自己去唱、写、实践。他刚站在电影文学创作的门槛前,就得到了文学家夏衍的关心、支持和教导,所以他很年轻就得以跨进了多彩的电影殿堂。另外,他还善于与导演“珠联璧合”。电影导演陈怀凯说过:“导演可能把一部好的剧本拍成差的影片,但导演不可能把一部差的剧本拍成好的影片。”这说明剧本是电影成功的基础和灵魂。我认为周民震写的剧本是好的,同时他也遇到了好的导演,如陶金。他还三度与喜剧大师谢添导演合作,受益匪浅。

60多年来,周民震除了写电影文学剧本之外,还写了不少舞台戏剧剧本、散文、小说、论文和诗歌,前年他给我寄来《周民震散文选》,我都拜读了,觉得很不错,他写的散文不是虚构的、想象的散文,而是他亲身经历、亲身感受的散文,读后使人觉得亲切、真实和感人。

回族学者郝苏民发来一封邮件,是他刚刚编好的随笔集《骆蹄集》的文稿。细细琢磨他所拟定的书名,不期然地就想到了“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诗句,也就从中多少读出了他的苦心:他把自己比作一匹终年在漫漫沙漠里负重跋涉不辞劳苦的老骆驼。以骆驼自况,对他而言,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郝苏民的这束随笔,乃是这个朔方回民之子,如今堪称是民族传统文化、人文学术净土守护者的“尕老汉”,从1986年起主持《西北民族研究》学刊以来至今30年期间未曾间断,以每期一篇“卷头语”的形式留下来的一串串脚印。碰巧的是,文章共77篇,而其人正逢77岁!意味何其深长!西北花儿有段唱词儿说:“一个(么就)尕老汉哟哟/七十七(来么)哟哟/再加上四岁者(叶子儿青哟哟)/八(呀)十一(来么)哟哟。”黄土地里迎着劲劲的朔风长大变老了的尕老汉,对待世事,严谨也好,炎凉也好,总能怀着一副乐天的神态,常常是“既唱且弹,伴有诙谐性鬼脸或即兴约定的体语:叉腰耸肩、比画手势等,以顿拍、节奏协调彼此动作,滑稽又戏谑,放怀更无羁,气氛轻松活跃,实在痛快。”满脸络腮大胡子的郝苏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即使在苦中也要作乐的尕老汉式的作家兼学者吧。

随笔,是社会和历史所需要与养成的一种散文形式。作者对世事、人事、文事、学事有感而发,题材随时捡拾,一鳞一爪,尽收笔下,抒情、叙事、评论,兼有而不拘一格,篇幅短小却不避锋芒,语言灵动而不乏犀利。我做过多年的刊物编辑,在我漫长的编辑生涯和阅读历史中,曾经形成一种不足为人道的私人看法,即:好的随笔并非一定出自作家之手,倒是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论是从事文史、社会学研究的私人,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私人,他们所写的一些随笔,往往更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文章也就自然更有嚼头。郝苏民的“卷头语”随笔,也许就属于这一类吧。

我的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也是吃编辑这碗饭过来的,在这一行里,见的、看的、接触的、经历的,可说是不计其数,但像郝苏民这样能连续在一家学术期刊的主编位子上干就是30年的人,却着实并不多见。无疑他是一个例外,也算得上是个幸运儿。君不见,他主持这本学术期刊的岁月,跨越两个世纪,其时正遇上中国经历着改革开放的蓬勃进程,信息化、城镇化闹得沸沸扬扬,价值观念或明或暗地被改变,理想精神被消解,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学风不正、道德失范日见凸显。而以改造和推动社会进步、坚守学术道德和治学正气、发扬人文精神和抵制物质主义为己任的郝苏民,他的那支笔,从一开始就没有仅仅限定在纯学术问题和圈子里的学问问题上,而是时不时地把自己的视野和目光扩展到了全社会,抓住一点,生发开来,直抒胸臆,抨击现实,发扬正气,指斥邪恶。于是,如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人文精神和思想追求,几乎渗透在每一篇篇幅短小、文风轻松的随笔里。他的这些文字,几乎都是精心之作,而最大的特点是与学院式的、书生气的玄论无缘,既非锈迹斑斑的旧八股,也不是花里胡哨的洋腔调,而是以治学者的视角、思想者的理性、随笔家的穿透力,“尕老汉”的幽默感,给社会和读者“存下了那一段世象、那一片生活,那霎时一角世相、一瞬间的心态或半墨思绪的残影”。对于一个艰苦的笔者来说,我想,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郝苏民半生坎坷,是改革开放给他的命运带来了转机。跌宕艰苦的人生境遇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出色的蒙古学者。作为作家,他著有长篇小说《曙光》、随笔集《我不再是羊群的学者》,翻译过外国文学《金蛋》《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等;作为学者,主要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其人其文广为人知。近10年来,在西北诸民族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贡献良多。而《骆蹄集》不过是他人生著作的“另类”。苦难是智慧的摇篮。这部“另类”之作,也许比那些冷冰冰的学术著作,更多更深层地显示出他的人生底色——人格。

尕老汉的三十年蹄印

□刘锡诚

■声音

歌曲中这样唱到:“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照此逻辑推理,中华文化艺术苑也应该有56朵文学鲜花,由他们强动的心声,这才是“百花齐放”。花园锦簇、群芳斗艳、万紫千红,文学园地才能呈现出真正的生命活力和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理想目标不是幻梦,也不是空想,它有着雄厚的现实基础和美好的前景,是有望实现的五彩蓝图。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本身拥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和自己的家园血肉相连、血脉相承,与这片土地同命运共呼吸,有着血浓于水的真挚情感。他们的先辈艰难跋涉,从远古走到今天,那种脚踏实地、锲而不舍、勇往直前的精神,深深注进了民族作家的血液之中,培育和磨砺了他们的性格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情操。他们就像那冬虫夏草、高原耗牛和东方神犬藏獒,抗高寒、抗缺氧、免疫力强,生命活力旺盛。他们有韧劲、能奋斗、坦然豁达、不离开不、不浮躁、不气馁、吃苦肯干,有着自己的人生坐标和价值取向。

其次,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比如藏族作家,从小就受到各类民族文学的熏陶,从而培养了对文学创作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这些作品中学习到了丰富的写作技巧,并获得了丰富的想象力。

民族作家还有着几近先天的哲思思辨能力。中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辩证思维强劲丰厚,同时,信仰引导人们趋善祛恶,走向真善美的文明境界,这就必然锻铸民族作家的灵魂、性格、心理、情感,使之向善、博爱、善良、真诚的天平倾斜。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已成为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特别是佛教的辩证认识和方法论,有无意地把他作者推上了较高的境界。作家可以俯瞰人生和世界,洞察万象、抓住人性的复杂性、提炼生活的真谛,从而有可能创作出经典性的作品。另外,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也提供了形象的辩证思维教育。或山大沟深,自然条件恶劣;或风雪高原,气候瞬息万变。自然辩证的现场启迪,不能不使他们在思辨认识上早熟。辩证思维的成熟,有助于作家把握作品主题、塑造人物性格、构思故事矛盾,做到立意的高深、逻辑的严谨、故事的合理,使作品具有更强烈的普世意义。

民族作家,尤其是西部民族作家,还有着体质上的优势,他们的食品结构多来自牛羊羊肉和乳制品,富含高蛋白。这些都锻造了他们生理的健壮结实,使之能够适应高原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并能精力旺盛地耕耘自己的一方家园。

另外,独特的生存环境和良好的高等教育机会,都给民族作家的成长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养分,使得他们具备了创作的各种优势。

但是,优势不等于现实。民族文学的繁荣还存在不少缺憾,影响着民族作家的成长。

当今活跃在民族文学舞台上的大多是“70后”、“80后”以及“90后”作家。他们有热情,有朝气,有活力,受过较好的教育,知识面广,写作技巧较娴熟,但他们又有着极为致命的先天性缺憾。那就是生下来便与自己民族的生存空间、与母体民族文化有着一定的距离。从小随亲人在城镇长大,接触的是汉族文化,受的是儒家价值观、审美观的教育,血管里流淌的民族文化传统本身不多,再加之脱离母族的地域文化和独特生产、生活方式,吮吸到的母乳自然难以胜任本民族生活创作的营养需要。而那些急躁的社会风气又使他们浮躁、迷惘,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只得追风赶时尚,

民族作家的优势与缺憾

□尔藏才旦(藏族)

精神上到处漂泊徘徊。先天“缺氧”、“缺奶”、“缺钙”,导致作品立意肤浅、根基不深、特色模糊、语言乏味,因而得不到母体民族的认可、尊重和推崇。这对民族文学的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若不加加以扭转,民族文学就有可能走向萎缩,走向枯竭。

“缺氧”、“缺奶”、“缺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民族作家对其认识不到位,沉溺于虚妄和迷惘之中不能自拔。要痛下决心,改变现状,惟有回归到自己血脉之中,老老实实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真正了解、熟悉自己同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体验他们的生活实践,融入他们的情感世界,感受他们的理想追求。主动投入本民族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历程中,化为故土社会的一颗普通细胞,才会拥有真正的创作资源,作品才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气息,勾勒出一个民族艰辛而辉煌的历程,向世界呈现自己民族多彩“秘史”。

这当然只是第一步,深入探索本民族的根谱,认识本民族的历史,了解本民族各方面的风俗习惯,浸泡于民族文化的渤海中,是不可少的又一环。有了这一条你才会有创作的资源与激情,才能浓墨重彩、独树一帜地写出自己民族的风采和个性,把自己民族不同一般的价值观、宇宙观、审美观展现给读者。

不同的地域产生不同的文化,地域元素在文学创作中十分重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地理决定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意志。民族精神也影响着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当地的文化氛围,从而铸造了作品的独特韵味。民族作家是无法回避宗教的,宗教弥漫于

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世界。祖祖辈辈从古至今,从牙牙学语起,就有意无意呼吸宗教空气,宗教理念深深渗透他们的骨髓和血液之中。在我看来,宗教不仅是宗教本身,而且是一种哲学,是智慧的象征。而且,宗教和文学有很多的类似之处,比如都追求真善美。因此,民族作家对宗教不应排斥,而是要积极地去理解,特别是要注重提升自己在创作中的“辩证思维”。用辩证法去提炼生活、剖析人物,可以开启作家的智慧,拓展作家的视野,探索所描写群体的心理、信仰、行为模式、精神世界等,使作品更加真实、鲜活、丰满、厚重。更重要的是,那些带有宗教意识的作家,总是能够赋予自己的作品更为深厚的文化意识,使作品真正体现本民族的风情。

乐天心理容易带来情性和松懈,进而沾沾自喜、浅尝辄止、不求上进、固步自封。因此,民族作家在创作上既要

有自信的心态,也要始终保持谦虚学习的态度。民族作家在文学修养上还要走很长的道路,而学习经典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认认真真地研读经典作品,才能弥补自己在创作观念和方

法上的不足。踩在前辈贤哲的肩膀上,可以帮助作家更新观念、开拓视野、提升技能,从而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来。但是,这里强调继承,并不意味着不注重创新。我们呼吁的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但只有把它与辩证思维结合起来,才会在沃土上长出丰硕的果实来。思想是灵魂,辩证法是利刃,有思想才有营养,文学的真谛在于提炼生活、揭示生活,从而结晶为诗、提升人类的文明境界。

同时,文学是语言艺术,民族作家的文学语言应该有能代表自己民族语言结构韵味的风格。这种风格来自自己植根的土壤,来自自己的民族文化。

同时,文学是语言艺术,民族作家的文学语言应该有能代表自己民族语言结构韵味的风格。这种风格来自自己植根的土壤,来自自己的民族文化。

同时,文学是语言艺术,民族作家的文学语言应该有能代表自己民族语言结构韵味的风格。这种风格来自自己植根的土壤,来自自己的民族文化。

同时,文学是语言艺术,民族作家的文学语言应该有能代表自己民族语言结构韵味的风格。这种风格来自自己植根的土壤,来自自己的民族文化。

开放的“那里”欢迎你

——评蒙飞长篇小说《那里的生活》 □伊 蓝

参加某个培训班的学习,蒙飞代表学员在开班典礼上发言。主持人介绍蒙飞是“双语”作家,曾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过后,大家开玩笑说,蒙飞,你那“双语”的另一语是希腊语还是西班牙语?蒙飞扬起下巴,歪斜着眼,故作严肃又不自自豪地说:“你们怎么那么孤陋寡闻,言必称希腊?那一语当然是我的母语——壮语!”

初悉蒙飞,觉得他朴实且话不多;稍熟悉之后,感觉他有一些世故;后来有机会坐了一回他的车,发现车上有很多佛教音乐,还有一些佛学书籍。而彼时,他正要带我们一千人到江边大快朵颐。我们笑他“酒肉穿肠过”,他则很配合地回应“佛祖心中留”。不过随后他又很严肃地解释道,人生在世,在追求个体成功满足的同时,还是应该做一些善事。

“文如其人”这四个字,应该可以用来评价大多数的作家。木心说过,知识学问可以伪装,但品性伪装不了。读完蒙飞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那里的生活》,我感觉自己看到了作者世故外衣下朴实而慈悲的灵魂。

小说中,“那里”是离南宁市100公里的壮族村寨,“那里”在壮语里意为“有溪水有田地的地方”。一开篇,小说就铺排了壮族农历六月初六盘吉节的热闹场景:各家各户清扫庭院、杀鸡宰

鹅;嫁到外乡的三姑六婆赶着回娘家过节;年轻人组成巡游队抬着代表盘古大神的石碑挨户巡游,人们放炮迎接;村民们暗比各家鞭炮的响数……小说的主人公——下岗回乡的覃树文,便在这喧闹之中素颜登场了。小说一开头,就让读者隐隐感到了热闹背后的无奈和凄凉。

小说以参加对越反击战后至到南宁当了几十年工人、55岁时下岗回乡的覃树文的生活为主线,为读者铺展了一幅宏大的当代城乡生活画卷。小说涉及当代农村很多的问题:农村养老、赌博、留守儿童教育、进城农民工身份尴尬、中专毕业生就业、青年农民婚姻、新农村建 设……除覃树文外,村长覃乃达,村民黄胜利、黄明忠、韦启福、韦老拐,小学教师覃柳,以及这些村民的父母子女的命运,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壮乡生活全景图。总体来说,作者对村民的生活寄予了美好的期望。经过一系列的彷徨和失败,覃树文终于取得了成功:他借钱买的母牛尼里拉菲下了牛崽,他在果园里养鸡土鸡,在村里搞农家乐赚了钱。更重要的是,覃树文没有满足于自己个人的脱贫,他要带着“那里”村所有的父老乡亲开展合作经营。他们办起了养老院,规划了观光农业园区……小说结尾,离乡打工的农民大都回到了故土,原本萧条的壮族村寨又充满了勃勃

陕北的独特风情

——读曹洁散文集《素履》 □张继炼(蒙古族)

陕北是一个历史概念,延安是这个历史概念里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坐标。因而,一直以以延安就是陕北,陕北就是延安。知道了榆林,才懂得陕北是一个大概念。即使我真的没有到过榆林,我也熟知了榆林的古城、镇北台、红石峡——因为曹洁的散文集《素履》。曹洁笔下的陕北是另一个古老而现代、苍凉而辉煌、喧嚣而凝重的陕北。如此,榆林,陕北,就印入了我的脑际,灵魂与精神。

《素履》包括“陕北风物”、“秘境素履”、“草原漫笔”、“古风素描”等章节,主要收入的是她这些年来旅行心境和思考,属典型的游记。旅行,需要文字来记录。只有记录了,旅途中的发现和思考才能完整地表现出来。许多游记只是把时间、地点、人物罗列下来,读起来是自然非常乏味、无聊。而好的游记主要

书写的是游者的内心感受与思考。

曹洁的游记表现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感受。在其散文中,除了必要的交代和简洁的叙述,你读到的就是作者的深层思考。不同的景观带来不同的感受。而一个景点的数次造访,一个人物的数次描写也都会有所不同。比如,第一次进大沙漠的人,随着沙漠野车的强烈颠簸,会紧张、晕车、呕吐、叫喊,紧抓车体……几十公里的“沙海冲浪”寻求的就是这种刺激。在《月壳睡在腾格里》中,曹洁这样写到:“乘着沙漠越野车在古老的黄沙上冲浪,身心颠覆的感觉居然让我觉得安全和温暖,犹如骑在马上,回到了原始的部落,原始的家园,一种生命本源的归宿感,蓬勃而起。”我喜欢这样带有独特感受的文字。

散文的语言叙述和驾驭能力,是曹洁文写的第二个特点。有人说,思想是散文的灵魂。这当然没错,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在写“思想”,但是思想要通过美妙的文字来表述。曹洁的语言是一种诗化的语言,凝练、简洁、温润……文学语言的生成离不开作者所创设的各种语境。因而,文学文本中的词语不仅具有它本身的词典意义,而且还包含一种由特定语境所形成的含义,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言外之意”。曹洁的散文就带有这样的言外之意。其语言具有无穷的张力,并伴有优美的韵律。

曹洁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跟她纯厚的文学功底和扎实的古文修养有关。读过《素履》以及曹洁的其他文章,会发现她走过的古迹很多,对于古迹的思考、研究较多。书中的“陕北风物”、“古都印象”、“古风素描”等章节,谈“古”论今,富有韵味。读这些文章,在品味优美文字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深深的“古意”。这可能与她职业有关,更与她勤奋好学有关。

这一两年,曹洁的文章开始在全国报刊发表,受到了许多人和一些专家的关注。期待她能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